

漫画诸子百家

孟子

文字 / 黄中业

绘画 / 郭竞雄 孙轶斌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漫画诸子百家

孟子

文 绘
字 画
／ 孙
黄 轶
中 斌
业 雄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儒 门 亚 圣



郭竞雄 / 图文

“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，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”《离妻上》

“民之憔悴于虐政，未有甚于此时者也。”《公孙丑上》

这是孟子对他所生存时代的描述。孟子出生于公元前372年，正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。据史学家统计，战国242年之间，见于记载的战争有460多次，不论战争的规模，时间的持久与残酷的程度都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。连年的战争与天灾瘟疫，让百姓流离失所，苦不堪言。到处是一片悲凉、腐败的景象。就在

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，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—孟子，也诞生了他那永远散发着人性主义光芒的伟大哲思。

孟子的生平

邹国，今山东省邹城市市北25华里的凫村。也称傅村，古称孟儒里。就是现在的孟子故居。与孔子家乡鲁国非常近。孟子自己也说“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。”在方圆几十里地的境内，竟能产生孔子和孟子这样两位世界级的大思想家，足以令当地人骄傲自豪了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有许多非常著名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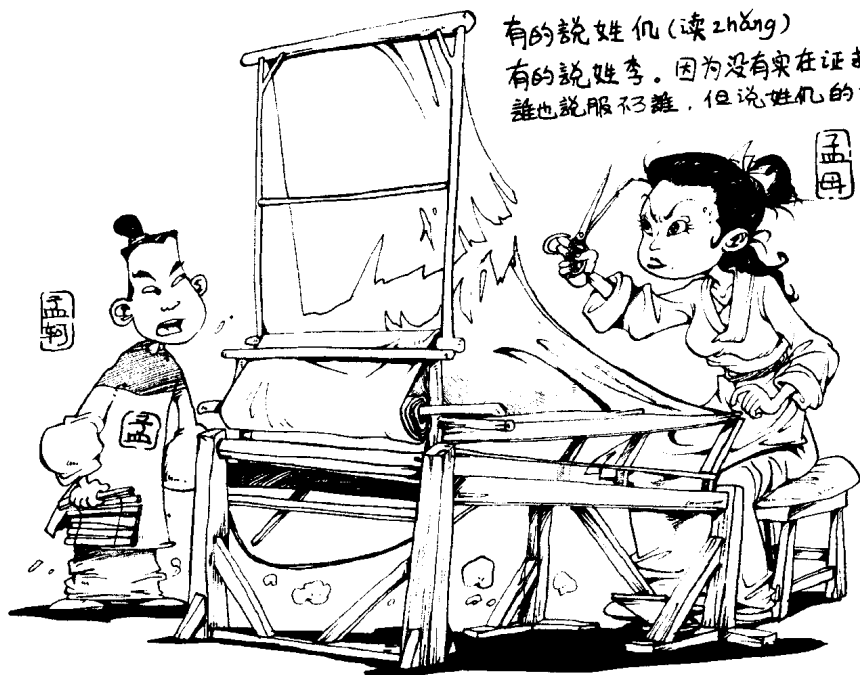


孟子母亲姓氏说法不一。

有的说姓仇(读zhǒng)

有的说姓李。因为没有实在证据
谁也说服不了谁，但说姓仇的多一些。

孟母



母亲。这些伟大的女性为中国的历史书上了光辉的一页。孟子的母亲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。关于孟母教子的故事，流传的很多，在《三字经》中“昔孟母，择邻处；子不学，断机杼”的名句，讲的就是这些事儿。

三迁的故事

起初孟子家邻近墓地，常有送葬的从家门口经过，披麻带孝，哭哭啼啼，儿童好模仿，年幼的孟子也就跟着学做“墓间之事”。孟母感到这个地方不适合儿子居住，就把家搬到了靠近街市的地方。街市上买东卖西，熙熙攘攘，很是热闹，年幼的孟子又模仿商人，做“炫卖之事”。在

孟子那个时代，社会上不同职业的人们是按士、农、工、商顺序排列的，认为商人不诚实、不可靠，地位最低，和现在的看法完全不同。孟母感到这个地方也不适合儿子居住，又把家搬到了学宫旁边。学宫讲习礼仪，书声琅琅，年幼的孟子也就模仿“揖让进退”。孟母感到这个地方很适合儿子居住，就在这里住了下来。

断机的故事

一次，孟子读书读着读着不耐烦了，跑回家。孟母正在织布，知道这种情况之后非常生气，拿起刀来，把正在织的布全都割断了。那个时候布是自己一梭一梭织出来的很不容易，“引刀裂其织”是很

大的牺牲，要下很大决心才行。孟母这样做，就是要以此教育孟子好好读书。孟子果然受到了教育，自此之后勤学不息，大有长进。

杀豚的故事

孟子小时候，一次邻家杀猪，孟子问：“邻家杀猪干嘛？”孟母随口说：“给你吃。”此话刚出，孟母就后悔了，心想，我怀这孩子的时候，席不放正不坐，肉割不正不吃，为的就是“胎教”，可今天却骗了孩子，这等于是教孩子不讲信用，但话已出口，不能收回，为了不欺骗孩子，硬是出钱把邻家的猪肉买了来给孟子吃。

休妻的故事

孟子娶妻后，一次妻子独自一人在

家，随意蹲坐在地上，这种姿式古代叫做“踞”。那个时候人们是很讲礼仪的，怎样坐有很多规矩，相比而言，踞是很随便的姿式，只有在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才能用。孟子悄悄进去，看见妻子这个样子很生气，转身就出来了，对母亲说：“妇无礼，请去之。”过去，男子如不满意可以不要自己妻子，这种“休妻”，用现在的话叫“解除婚约”。孟母问清缘由不仅没有责怪儿媳，反而批评孟子说，你去人家“燕私之处”，不事先咳嗽一声，弄点声响，让人家有点准备，这是你的无礼，而不是妻无礼。“于是孟子自责，不敢去妇。”

孟子师从子思的门人，是孔子的孙

不失信于人，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要求，父母不失信于子女，哪怕一言一行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。对孩子的人格养成会形成相当大的影响。不得不承认孟母的伟大之处。



常有人言，婆媳难处，不知站在“礼”的角度上来要求，会不会带来好的结果？……



子的学生的学生。但对孟子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子思了。他们在思想上有相当的一致性，所以有人将其合称为“思孟学派”，是很有道理的。孟子的经历和孔子很相似，在正式出仕之前大约也讲了十来年的学。孟子说天下有三大乐事，其中之一就是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。”在孟子的一生中弟子很多，甚至一度出现“从者数百人”的盛况。其中比较有名的如乐正子、公孙丑，万章、公都子等。《孟子》一书的最后成书离不开这些弟子的努力。

儒学是主张入世的，主张积极参与社会生活，过问现实政治。这个特点在先秦表现得非常突出。儒学创始人孔子主张积极入世，他的学说始终没有离开过现实社会。孟子也是一样，我们在读《孟子》的时候，很容易为他的现实批判精神

所吸引，为他的忧世忧民情绪所感染。这当中所透露出来的，就是入世精神。在当时，对于士人来说，要入世就要出仕为官，这是直接介入现实政治的唯一办法。不然，一介布衣，本事再大，在国家政权中说不上话，也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。孔子讲“学而优则仕”。大约在四十岁左右，孟子可能是在邹国出仕的，因为这毕竟是他的父母之邦。孟子出仕不久，就遇到邹国和鲁国打仗，邹国为此大小官员死了几十人，老百姓却没有为此牺牲的。邹穆公很生气，问孟子应该怎么办。孟子一点不向着邹穆公，反而批评他说，这完全是你自找的，你平时对老百姓不好，国家有了危险，老百姓自然是见死不救了。这就叫“出乎尔者，反乎尔者”。邹穆公是遇到难题才请教孟子的，

儒门亚圣—孟子

孟子简介

没有想到反倒挨了一顿批评，心里不痛快可想而知，这可能直接导致了孟子在邹国不被重用。孟子看到在这里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，就离开了父母之邦，怀着远大的心志，远游他乡，坚定地踏上了茫茫的游历路程，开始了漫漫的游说的生涯。

大约在公元前330年，孟子从邹国来到了齐国。这时齐国是威王当政，稷下学宫办得很热闹。孟子这次游齐没有受到齐威王的高度重视。《孟子》全书中孟子与齐威王的对话一次也没有，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孟子人微言轻，知名度还不高，或所推行的政治主张不合对方胃口，或有其他什么原因。这次游齐期间，孟子的母亲去世了，因为孟子是鲁公族的后代，祖墓在鲁国，所以孟子将母亲葬于鲁国。孟子守丧三年后，回到了齐国，看到在这里已经不能得志，就在公元前324年离开了齐国。离开齐国之后，孟子风尘仆仆来到了宋国。宋是一个小国，东临齐国，南面楚国，西向魏国，在诸强之间艰难地维持生存。在这样一



个小国能不能实现孟子的政治主张，弟子们有些怀疑。孟子认为，国不在大小，关键看有没有道，如果有道，人心相向，四海之内皆举首仰望，齐国楚国再大再强，也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对在宋国实现其政治抱负充满了信心。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。同在齐国一样，《孟子》中也没有留下同宋王的对话，孟子在宋国也不是很得志。

在宋国的时候，滕太子有事去楚国，路经宋国，在宋国拜见了孟子。“孟子道性善，言必尧舜”，与他谈得比较投机。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滕太子从楚国回来的路上，又一次拜见了孟子。孟子再次与他大谈治国之道，劝其学习圣贤，实行王道主义。这两次见面谈得都不错，为孟子与滕太子日后的交往创造了条件。滕太子回国不久，父亲滕定公就死了。滕太子继位后派人专门到邹国问孟子，应该如何办丧事。滕太子派人两次向孟子请教丧事，孟子劝滕太子行三年之丧，是孟子游历前期办得最成功的一件事情，滕太子也是唯一愿意听孟子话的君主。这



孟子非常崇拜孔子，对没能亲自聆听孔子的教谕而感到遗憾。

件事情似乎预示着孟子政治前程将要出现一个转机，但实际上孟子期盼已久的这个转机后来始终没有出现。孟子在公元前322来到了滕国。这时滕太子已正式继位成为滕文公，热烈欢迎孟子前来，安排了上等的住处，厚待不菲。这是孟子游历享受到的最高等级的待遇，此后孟子出游才有了“扣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”的庞大规模。滕文公不光在物质上待孟子不薄，而且多次与孟子相见，向孟子请教如何施行仁政，只是到了这个时候，孟子才有了充分展示自己思想的机会。第一次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仁政的思想。孟子与滕文公表面上谈得很好，但实际上已隐藏着危机。孟子在滕国待了三年，看到滕文公终究没有实际采纳自己主张的意思，觉得在滕国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了，恰逢听说梁惠王重礼招纳贤者，就由滕国来到了大梁。这时是公元前320年。

孟子来到大梁，很快见到了梁惠王。梁惠王一见孟子就问：“叟！不远千里而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希望孟子能为他带来良方妙策，使该国恢复元气，迅速强盛，一雪前耻。孟子来这里之前对其国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，深知梁惠王所说的“利”无非是征战夺地之类，而在孟子看来，这种征战夺地绝不是治理国家的最好办法，只有仁政才是理想的治国之道，于是马上回答说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梁惠王招来孟子，是为了魏国迅速强盛，孟子见梁惠王，是为了推行他的仁政王道，尽管方法有异，目的却是



孟子与鲁平公的一次擦肩而过，完全是由于臧仓的挑唆。难道孟子真的与政治无缘？还是政治与“仁义”无缘呢？



相同，这就使他们间的谈话比较多。这些内容都因梁惠王的问话引起，具体内容虽然不同，中心只一个，这就是劝梁惠王赶快施行仁政，不要拖延。但是，孟子好像很不走运。他信心十足地做梁惠王的工作，眼看出现了一线转机，梁惠王却死了，继任的梁襄王又没有人君之相。这个时候刚好齐威王去世，齐宣王初立，孟子似乎在齐国又看到了新的希望，于公元前319年离开大梁，再次来到了齐国。

在整个孟子游历的生涯中，再次游齐是最重要的一站，呆的时间比较长，有关活动比较多，加上齐宣王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君主，有治理好国家的强烈愿望，至少在表面上还能够听别人的话。可能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是孟子与所有君主对话中最多的。孟子与齐宣王对话，语辞锋

利，不留情面，这几乎构成了孟子这一时期谈话的一个特点。一次，宣王问贵戚之卿，孟子说，君主如有大错则劝阻，反复劝阻不听就改立国君，直说得宣王“勃然变乎色”。要知道，这些对话的对象可是一国之君啊。只有设身处地地将自己融入到当时特定的情景中去，才能感受到孟子和齐宣王这些谈话所隐含的人文精神，也才能够体会到孟子的伟大之处。孟子这般气势，这般硬骨，这般不假辞色，这般直道而行，实在是太宝贵了。

齐宣王深感有愧于孟子，而孟子在齐国施行仁政的理想也破灭了。孟子打算辞去卿位，离开齐国，齐宣王专门看望了孟子，表示挽留之意，并托人告诉孟子，想在都城中送幢房子给孟子，用万钟之粟养活他的弟子，好让大夫和国人都有所效仿。但孟子坚辞不受。尽管孟子去

意以决，但他心里很清楚，一旦再次离开齐国，就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实现他的仁政理想了，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努力就将彻底失败了。他心不甘，意不死，他仍留有一线希望，尽管这种希望十分渺茫。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，在齐国边境的一个叫做昼邑的地方住了三夜，希望齐宣王能够改变态度，召他回去，完成平治天下的伟大使命。三天下来，音信全无。孟子茫茫然踏上了归程。这就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，在历经挫折，饱经风霜，终于确认自己奋斗一生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之后的内心独白，几分自信，几分无奈，几分凄凉。孟子不甘心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就这样完了，不能流传于

世，决心仿效《论语》，著成一书，阐明自己的主张，记述自己的一生。著书工作一直持续到孟子逝世，书成，名为《孟子》。孟子逝世于公元前289年，享年84岁。

孟子的历史地位

孟子逝世后，孟子的地位有所下降。孟子是公元前289年逝世的，而秦统一中国是在公元前221年，这六七十年间战争不断，世风惨烈。孟子活着的时候，其思想主张就被认为是“迂远而阔于事情”，已经不容于世，到这个时候再想推广，当然更是难上加难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又有了焚书坑儒。虽然据赵岐《孟子题辞》说，《孟子》因列入子书，幸免于秦火，但

孟子凄然地望着来路，在昼邑的三天等待，为其政治主张的实践画上了句号。在今后的日子里，究竟会不会有“仁义”治国呢？……



儒门亚圣—孟子

坑戮儒生也使孟子徒党大受挫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孟子的地位走下坡路，自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汉代孟子的地位开始回升。这个时候最为荣耀的事情，要算是汉孝文帝时设立《孟子》博士了。但这个时期孟子地位并不很高。当时人们一般还是把周公和孔子连在一起，合称周孔，或把孔子和颜渊连在一起，尊孔子为“至圣”，颜渊为“亚圣”，合称孔颜，极少有孔孟并称的情况。

到了宋代，孟子地位开始上升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孟子升格运动，这个运动的重要标志，就是《孟子》由子上升为经。孟子升格运动的倡导者是唐代末年的韩

愈，是他首先有意识地把孟子的名字升到孔子后面，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，揭开了孟子升格运动序幕。韩愈说，儒家也有自己的道，这个道是尧传给舜，舜传给禹，禹传给汤，汤传给文王、武王，周公传给孔子，孔子又传给孟子，孟子死后就再没有传下来了。在这个排列中，韩愈明显把孟子视为孔子的真传，得出了“求观圣人之道，必自孟子始”的结论。韩愈用尊孔孟代替唐初以来的尊孔颜，真是慧眼卓识，气魄不小。到了北宋，重视孟子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提倡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，推崇“孔子之后，唯孟子最知道的”的欧阳修，都

魂魄浮魂不可招，
遗编一读想风标。
何妨举世嫌迂阔，
故有斯人慰寂寥。
欲传道义心虽壮，
学作文章力未穷。
他日若能窥孟子，
终身何敢望韩公。

— 王安石



是重要代表，但其中出力最甚的，可能还要算孙复和石介。当然，他们的努力只限于学理和舆论方面，而要把孟子升格运动推向实际，产生实际效果，还必须要有一个人真正掌握实权的人。历史提出了这个要求，也创造了这个人物，满足了这个要求，这个人就是王安石。王安石是变法的领袖人物，他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，使孟子升格运动得到朝廷的支持，孟子升

格运动在付诸实行方面，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就的进展，其中包括：《孟子》首次列入科举；立孟轲像于朝廷；封孟子为邹国公（这是孟子首次被皇帝赐以“公”的爵位）；首次允许孟子配享孔庙；朝廷承认兖州邹县孟庙，并命乐正子配享，公孙丑以下十七人从祀；《孟子》首次刻成石经，成为实际的“十三经”之一。南宋时期，孟子升格运动已进入尾声，尊孟成



了流行的学术倾向。朱熹穷一生精力注成的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“四书”，不仅成为后世学人必读书目，也列入科举考试重要内容，《孟子》作为“四书”之一，地位已经超过了“五经”。至此，《孟子》上升为经，孟子升格运动基本完成。在这之后，元代对孟子的封赐达到了顶点。1330年元文宗发旨，盛赞孟子，并“另封邹国亚圣公”。这是孟子首次被朝廷封为“亚圣”。从此，颜回改称“复圣”，“亚圣”的桂冠正式戴在孟子头上，成了孟子的专用名词。

历史上非孟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，一是从学理上的非孟，二是从政治上的非孟。这里先讲学理上的非孟。历史上

第一个从学理上系统批评孟子的是荀子。荀子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《非十二子》，对先秦一些重要学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，其中也包括孟子。荀子主张性恶论，不赞成性善论。在汉代王充批评孟子最为有名。王充作《刺孟》，从八个方面批评孟子。比如，利分“货财之利”与“安吉之利”，与荀子从理论上驳难孟子相比，王充批评孟子多从一些小节入手，理论色彩不浓。在批评孟子的人中，也有“骂大街”的，宋代的郑厚就是其中之一。郑厚非孟的一个特点，是对孟子进行人身攻击。比如他说，孟轲是以口舌求合，自媒利禄，今日说梁惠，明日说齐宣，只是为了讨口饭吃，“此轲之贼心也”。在郑





厚的笔下，孟子是一个“诵仁义，卖仁义”，扶持仲尼，以欺天下的小人。历史上像这样批评孟子，真是前所未有的，也算是破了记录了。上述情况说明，不管是孟子升格运动之前，还是孟子升格运动之中，都存在一种学理上的非孟力量，这种力量虽然在理论上不无意义，但在尊孟的大背景下，似乎显得有点苍白。

除了学理上非孟，还有政治上非孟的。朱元璋罢孟子祀，是最著名的例子。公元1370年，明太祖朱元璋当皇上有三个年头了。一天，他读《孟子》，当读到“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之视君如寇仇”等句的时候，大概是触到了深恐臣民伺

机夺权的神经，恼羞成怒，大骂孟子。但当时孟子已经死了一千五百多年了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下令撤除孟子在祭孔子大典中配享的地位，将孟子赶出孔庙，并下诏凡有谏者以大不敬论。刑部尚书钱唐不管那一套，抬棺上朝，冒死入谏，说：“臣为孟軻死，死有余荣。”朝臣无不为其担忧，掌管天象的官员趁机也赶来报告，说是天象异常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朱元璋只好改口，没有治钱唐的罪，孟子配享也没有废除。今天看来，是否真的天象异常，很难讲，但钱唐却完全是一片真诚。为此钱唐得到了从祀孟庙的礼遇，至今孟庙东庑中还有他的牌位，位列韩愈

儒门亚圣—孟子

南侧。20多年以后，到了公元1394年，朱元璋心里还是不舒服，又命大学士刘三吾审查《孟子》的政治思想。刘三吾奉命行事，不敢不为，删去《孟子》原书中“词气之间，抑扬大过者”八十五条，编成《孟子节文》，而《孟子》原书“课试不以命题，科举不以取士”，几近废弃。朱元璋在政治上非孟，没有取得实际效果，不仅孟子从祀没有废除，《孟子节文》也没有真正流传于世。这说明，经过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之后，孟子的地位已很稳固，孟子政治思想与绝对君主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，早已深入人心，绝不是一两个皇帝

随便说句话就能算数的。

公元前1530年，明世宗嘉靖九年，对孔子“头衔”作了一次改革，去掉无关紧要的王号以及大成、文宣之称，只称“至圣先师孔子”。这样，孟子也跟着去掉了封爵，不再称“邹国亚圣公”，直称“亚圣”，并与复圣颜子、宗圣曾子、述圣子思共同配享孔庙。

公元1636年，皇太极改国号为清。公元1645年，清兵入关的第二年，朝廷祭孔子，孔子正中南向，四配仍是复圣颜子、宗圣曾子、述圣子思、亚圣孟子。这两个举动非同寻常，它标志着清代统治



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这种民主观念的提出在孟子以前恐怕再无他人了……

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。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



者在文化上仍然与明代保持着连续性，孟子亚圣地位不变。

公元1686年，康熙立巨碑于孟庙，盛赞孟子。公元1689年，康熙又在孔庙立石，御制《孟子赞》，赞扬孟子功劳很大，可与大禹相比。

乾隆对孟子特别尊崇。公元1748年，御制《亚圣赞》，在孟庙立碑建亭，赞许孟子功在天。他曾先后五次巡视孔子故里，与此同时，派大臣分祭孟庙。公元1757年和1762年还两次亲自南巡邹城，到孟庙拈香，行一跪三叩之礼。

明清两代，孟子已经牢牢坐稳了亚圣的交椅，和孔子的命运联系在一起，荣损相俱，这在20世纪的政治舞台上，也得到了淋漓尽致表现。

孟子的主张与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启迪

两千多年以前，社会生产还很不发达，人们在意识形态中还多少存在着如

何成就道德的理想。然而在那个战乱的年代，天下无道，世风惨烈。各种治国平天下、富国强民的政治主张都粉墨登场。其理念无非是在诸国林立的政治环境中异军突起，称霸世界，无非就是利益与名声的巧取毫夺，说白了就是为建立霸权而出谋划策。然而恰恰是在这个年代，孟子入仕，他大反其道而行之，积极主张“仁义”之国，力倡王道天下。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多少有些不合时宜。然而在某种角度上讲，孟子却代表了人民的主张，代表了民众的利益。孟子始终强调民心的作用。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，成为中国两千多年以来“理想政治”的代表。成为与专制对抗的主要思潮。

自孔子创立了仁的学说以后，始终围绕着“仁”字做文章的儒家学者不乏其人，然而“仁”是什么？“仁”从哪里来。孟子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孟子认为人应该